

作家与现代出版研究



鲁迅

生存与表意的策略

戈双剑 杨晶◎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鲁迅

生存与表意的策略

戈双剑 杨晶◎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生存与表意的策略 / 戈双剑，杨晶著.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2. 8
(作家与现代出版研究)
ISBN 978-7-5406-9552-1

I. ①鲁… II. ①戈… ②杨… III. ①鲁迅
(1881~1936) - 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79219号

策划统筹：邱 方
责任编辑：古春华
责任技编：杨启承
整体设计：黎国泰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472号12-15楼)

邮政编码：510075

网址：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州市穗彩彩印厂印刷

(广州市天河区珠村十三社西乡工业区B栋)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18.25印张 365 000字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06-9552-1

定价：38.60元

质量监督电话：020-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020-87621848

上编 鲁迅出版活动研究

绪 论》》》2

第一章 近现代出版业的历史演进与鲁迅早期出版活动》》》19

第一节 清末民初出版业概况》》》20

第二节 现代出版意识的“西学东渐”》》》25

第三节 鲁迅的早期出版活动》》》37

第二章 鲁迅出版理念的生成及表征》》》50

第一节 身份转换与出版语境的变迁》》》51

第二节 现代出版理念的表征》》》61

第三章 出版场域的内部分歧》》》80

第一节 出版场的形成及特征》》》80

第二节 出版场内部的斗争》》》89

第三节 惯习：出版场中“人”的因素》》》100



第四章 出版场域中意识形态的渗透》》》109

第一节 鲁迅与“左”倾刊物》》》110

第二节 鲁迅与“左”倾书店》》》124

第三节 国民党政府的别样“出版措施”》》》147

第五章 鲁迅后的出版界

——鲁迅著作及研究著作的继续问世

(1936—1949年)》》》168

第一节 鲁迅逝世后的出版语境》》》169

第二节 抗战时期鲁迅著作的出版》》》179

第三节 抗战胜利后的鲁迅著作的出版》》》194

第四节 鲁迅研究著作出版的滥觞》》》200

第六章 出版：作为生存与表意的策略》》》206

第一节 生存自由：书局提供的经济支持》》》206

第二节 表意自由：出版与话语空间的营造》》》214

下编 鲁迅出版活动史料

一、鲁迅与出版界研究的历史及现状辑录》》》228

二、书局为鲁迅提供的经济支持辑录》》》242

三、与鲁迅相关的出版单位辑录》》》252

四、抗战时期鲁迅著译出版情况辑录》》》255

五、抗战胜利后鲁迅著作出版情况辑录》》》258

六、鲁迅逝世后鲁迅研究著作单行本出版辑录》》》261

写在文学与出版边上》》》266

参考文献》》》274

后记》》》288

上编

鲁迅出版活动研究





绪论

刘易斯·科塞在论及知识分子（理念人）生活的场所时指出了八种制度化环境，如沙龙和咖啡馆、科学协会和月刊或季刊、文学市场和出版界、政治派别、波希米亚式的场所和小型文艺杂志，并认为它们对于西方世界知识分子职业的形成起到了孵化器的作用。对于出版界，刘易斯·科塞认为与书籍市场相伴而出现了一批书商和出版商，他们成为作者和不断增长的读者大众之间的媒介。^①

所谓的制度化环境也包括了当下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谈论较多的“文学生产制度”在内，或亦可称之为“文学制度”^②。同时，刘易斯·科塞也指出，“制度化环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知识分子与他们的公众直接或间接接触的媒介，还在于它可以成为某种类型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保护他们及其朋友免遭不情愿的干涉。换句话说，这些制度化的环境可以在知识分子群和普通人的世界之间树起一道边界，使分离和差异成为可能，并提供了一个躲避注意的盾牌”^③。刘易斯·科塞在这里强调了制度化环境对知识分子类型形成的重要性，也溯及了制度化环境对文学整体风貌的形塑作用，以及制度化环境存在的普遍性和重要性。由此而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诸多作家也处于制度化环境的制约下，如文学市场对于清末民初作家的影响、报纸杂志对文体变化的影响等方面，这其中出版界成为最主要的一环。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性人物，鲁迅的著译、生活、思想等诸方面均处于制度化环境的制约下，其中又集中表现于鲁迅与出版界的相互关系之中。从这一视角来研究鲁迅，实际上是在社会学视野下对鲁迅的再观照，需要面对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① 参见[美]刘易斯·科塞著，郭方译：《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② 参见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4~5页，2002。

③ 参见[美]刘易斯·科塞著，郭方译：《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5~6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这其中首要的三个问题必须考究。首先，是身份剥离的痛苦。鲁迅有多重身份，如作家、思想家、书评家、翻译家、美术家等都已得到学界的认可，但作为出版家的鲁迅却因隐没于其他身份背后而少有人提及。作为出版家的鲁迅，其活动与思想、理念又嵌入多重身份之中，要想清晰了解其出版活动，不得不进行身份剥离。但这样一来，又将面临出版史料的破碎和零散化。其次，是头绪繁多而又无法穷尽的细节整理。为了理清这一关系，必须要进入鲁迅与出版界关系的细枝末叶，严格来说，这等于要搞清楚鲁迅全集（共有18部）中所有作品，以及为数众多的单行本和各种盗印本的出版史。尽管我们不能迷恋一切细节，但毫无疑问，这是一项耗时巨大的系统工程。再次，是史料的钩沉、甄选。在一定程度上，使用新的资料就意味着新的解释方法的出现。^①面对浩如烟海的鲁迅研究史料，不但需要谨慎的对待，而且要求细心的分梳。因而，为了解决以上三个难题，并达到对论题的更为清晰的认识，还是让我们把概念的界定作为研究的起点吧。

一、研究对象及边界

1. 概念厘定。关于出版的概念，学界多有论述。《简明出版百科全书》认为出版是：“用印刷或其它机械方法将文字、图画、摄影等作品复制成各种形式的出版物，并提供给众多读者的一系列活动。”^②《现代汉语大词典》中则认为是：“把书刊、图画等编印出来，把唱片、音像、磁带等制作出来。”^③《辞海》中将其定义为：“把著作物编印成图书、报刊的工作，现代出版工作泛指出版、印刷、发行三个环节。”^④日本清水英夫在谈到出版时，认为出版有五个主要特征：“1. 非大众性。2. 是一种范围极其广阔的传播现象。3. 作为企业的出版，含有前近代性、近代性、超近代性的混合物。4. 出版是用文字传播文化的承担者，而文字传播无论在时间上或空间上都是传播信息的基本手段，并形成了有史以来的人类文化基础。5. 出版广义上指印刷媒介的刊行或印刷物的出版行为。”^⑤由以上概念观之，出版最基本的含

①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4页，上海，三联书店，2006。

② 《简明出版百科全书》，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

③ 《现代汉语大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④ 《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

⑤ [日]清水英夫著，沈洵澧、乐惟清译：《现代出版学》，13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



义是：“出版包括编辑、发行、印刷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出版以编辑为中心，以印刷为手段，以发行为桥梁。编、印、发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①本文取学界之通识，认为出版即是书籍、杂志的出版，包括编辑、印刷、发行三个方面。

“界”者，原为佛教用语，《广论》：“问：界为何义？答：任持无作用性自相是界义。”又《杂集论》云：“问：界义云何？答：一切法种子义，谓依阿赖耶识中种子说名为界，界是因义故。”“凡佛书中言界者，略有三义。一曰界者体义；二曰界者因义；三曰界者类义。”^②“界”义后随文化变迁推而广之，脱胎于体、因、类三义，多指境域、区划。故而出版界即在出版的基础上形成的相关的关系集合体，出版是其实体，也是其所以存在的内因和别于他物的区划。换言之，出版界包括以出版为基础而形成的编辑、印刷、发行三个方面业务及相互关系，也包括与出版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外围关系，可以说包容甚富。

如果将对出版界的考察纳入社会学视野，就会引出关于“场域”及“出版场域”的概念。何为“场域”？布迪厄说：“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specific profit）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situs），以及它们与其它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化约成支配其它场域动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③

出版场即是这样一个小世界，它有自身的必然逻辑，像艺术场域、宗教场域、经济场域、文学场域、政治场域一样，出版

① 许力以：《出版是人类进步的杠杆》，载《编辑学刊》，1989（2）。

② 熊十力：《佛家名相通释》，63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6。

③ [法]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133~13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场域也是按照既有特定逻辑在运转。场域有自身的结构特征，即是为了控制有价值的资源而进行斗争的领域，并把特定的斗争形式加诸行动者。出版场域中的出版者，为了获取最大商业利益和文化利益而相互竞争，这种竞争不但主要表现在作者、编辑与出版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上，而且还表现为其他诸多领域如政治场、经济场、文学场等方面的相互交锋，因而可以说这种繁复的关系构成了出版界与众不同的魅力。

2. 对象及边界。鲁迅与出版界这个话题是一个多线索话题，不但是鲁迅研究范畴内的课题，而且是现代文学与传媒框架内的主要内容之一。因其多线索，故而对它的定位也需要多方面的参照。

在鲁迅研究这个范畴内，“鲁迅与出版界”可以说是一个鲜有人涉猎的区域。张梦阳先生在《中国鲁迅学通史》中对鲁迅学从宏观描述、微观透视及理性反思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学在中国的运思走势，但对于鲁迅与出版界这样的研究点在目前的鲁迅研究中，却鲜有涉及。《中国鲁迅学通史》一书还对21世纪中国鲁迅学前景进行了展望，特别是在“新著作的走向”一节中，对新世纪出版的鲁迅学著作所反映出的新端倪、新希望进行了概述性评论，指出这些新著作预示了新世纪鲁迅学的走向：“多元化、个性化、民间化。”^①尽管代表了这种走向的新著迭出，但这些新著中，鲁迅与出版界也不见踪影。

在重要研究资料《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中，鲁迅与编辑出版这样的命题虽有提及，可也仅有四篇文章，分别是《鲁迅先生与〈译文〉》（黄源）、《鲁迅先生与新书业》（许钦文）、《鲁迅先生的辑佚工作》（郑振铎）、《鲁迅先生的梓印工作》（唐弢）。^②其中许钦文的《鲁迅先生与新书业》是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作者认为：“我国新书业得有目前的现象，好像也该算作鲁迅先生的功绩，不过我们不能不把这件事情看得很简单。”这篇文章刊于1936年11月《青年界》月刊，是目前研究鲁迅与出版界较早的一篇文章。

作为出版家的鲁迅，出版是鲁迅学研究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层面，然而，时下的鲁迅研究更多的是从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出

① 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下卷·二），717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

② 张梦阳：《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索引分册》，122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



发，以主流意识形态的、民间的、学院的阐释系统为主进行研究。其中，学院的阐释系统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思想史、精神心理学、文化学、比较文学、文本形式、哲学（总体结构性）等分析体系，成果蔚然大观，在社会变革中承续鲁迅遗产、阐扬鲁迅精神。但是对于作为出版家的鲁迅的相关研究，为数甚少，且散见于各级各类学术期刊，还没有较为系统、完整的研究成果（参见本书《鲁迅与出版界研究的历史及现状辑录》一节）。

近十多年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对“文学生产传播机制”的关注较为活跃，至近期已蔚然成风。对“文学生产传播机制”的研究主要包括报章、出版、教科书编纂以及读者研究四个相互关联而又各自独立的方面。^①对本文而言，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为报刊研究，一为出版研究。出版研究，着重于阐释出版对于新文学运行方向和发展方式的影响与塑造，“对于新文学的研究也在单一的‘文本研究’、观念研究之外开辟了制度研究的新领域”^②。鲁迅作为新文学开辟草莱之人，作为出版家对新文学的传播和发展作了巨大贡献。特别是鲁迅与诸多的出版社、书局的密切关系，以及自费筹办的书局对新书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③因而，“鲁迅与出版界”这一论题，也指向文学生产传播机制这一范畴。

现有的相关论著、文章从不同侧面贴近了现代文学与文学生产传播机制这一论题。1999年《中国现代文学丛刊》第1期以“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为题刊出一组论文，这其中主要涉及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一批活跃于上海二三十年代的出版机构，并且开辟了“制度研究”的新领域。然而，这些研究还只是小范围、散点式的，没有扩展到一个新的研究论题——那就是与现代文学并行的现代文学出版史。“鲁迅与出版界”研究的一个目标指向，即是提出这一研究论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作出进一步的研究。其后，相关的专著开始出现，如《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文学》（孙晶）是“通过一家出版社的兴衰史来看一种理想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实践所产生的作用，同时也看知识分子如何靠着理想推动文学事业的发展”。通过对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作家（如文化生活出版社与鲁迅的关系）、文化生活出

① 陈平原：《文学的周边》，119页，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② 温儒敏、李宪瑜、贺桂梅、姜涛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22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③ 参见许钦文：《鲁迅先生与新书业》，载《青年界》，第10卷第4期，1936年11月。

出版物研究两个层面，形象地说明“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的命运是与现代出版事业密不可分的，或也可以夸张地说，是先有现代出版事业，才会有波澜壮阔的现代文化和文学思潮”^①。而《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杨扬），则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兴衰史折射出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之间的互动关系，反映了民间出版业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意义，“将出版史的研究作为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问题的一个视角”^②。与以上两部专著的史料钩沉和研究方法不同的是，《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转型》^③将布迪厄的文学场域理论，直接应用于分析当代文学生产机制，这是近年来社会学理论应用于文学生产机制较有代表性的一部专著，彰显了出版与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诉求。《认同与互动——五四新文学出版研究》^④是对五四新文学与出版关系的系统性梳理和研究；《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⑤意在探讨商务印书馆与近代文化之间的关系，将文化史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拓展；《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⑥“从二十世纪的经济状况与文化背景切入”，在“对近代传播媒介的变革与文学兴盛原因的探讨”等方面，取得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⑦以上几部专著是近年来关于文学生产传播机制与现代文学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论著，虽然选取角度各不相同，但可以看出“对文学出版的关注、开发、研究，也渐次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⑧，且已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对于鲁迅与出版界研究这样论题来说，无论是从鲁迅学的角度出发，还是从现代文学与出版的角度观照，都具有合理性。因而本文对研究对象的定位在于，不但要从鲁迅学的角度出发，钩沉鲁迅与出版及出版界的史料，进一步完善作为鲁迅研究在出版方面的不足；还要从现代文学与出版的角度来探讨出版对于现代作家进而对现代文学的意义，特别是对“鲁迅”的生成意味。因

① 陈思和：《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文学·序》，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

② 杨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引言》，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③ 邵燕君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④ 路英勇著，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

⑤ 史春风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⑥ 栾梅健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⑦ 贾植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⑧ 孔范今：《认同与互动——五四新文学出版研究》，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



而再形象地说，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作为文学生产传播机制之一的出版及出版界是如何沟通鲁迅与现代文学的、出版及出版界对于鲁迅的生存是如何起作用以及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对于鲁迅的“表意”及其策略的形成又有何意义等诸多问题。

就研究的边界而言，如前文所述，出版即是书籍、杂志的出版，包括编辑、印刷、发行三个方面（不包括报纸），同时可能包括由此衍生出的相关方面如书籍装帧、广告，书业的销售等诸多问题。而出版界包括以出版为基础而形成的编辑、印刷、发行三个方面业务及相互关系，也包括与出版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外围关系。可以说研究边界较为宏阔，研究对象的形态和变化丰富。因而，这不但是本书的潜在难题，也是本书的特点所在。

二、研究历史及现状^①

鲁迅与出版及出版界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分别为发轫期、发展期、深化期。每个时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概述如下：

1. 发轫期。随着鲁迅的不幸逝世，纪念性、回忆性的文章纷至沓来，这其中包括鲁迅生活、创作、思想、斗争等到各方面的内容。鲁迅与出版及出版界的相关回忆和论述性文章也浮出水面。从鲁迅逝世到20世纪60年代初（约为1936—1961年）这一段时间，是鲁迅与出版界研究的发轫期，其主要特点是：对鲁迅与出版及出版界的相关史料的回忆、梳理和整合，并呈现出多角度、多层次的局面。

黄源在《鲁迅先生与〈译文〉》中回忆了《译文》创办的经过及鲁迅的支持，并特别提及了鲁迅与北新书局的版税问题。这是回忆鲁迅与杂志出版关系较早的一篇文章。同性质的文章还有对鲁迅与《浙江潮》的回忆（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其后，对鲁迅与具有出版功能的文学社团的回忆也开始出现，如林辰的《鲁迅与狂飚社》、李霁野的《谈〈未名社〉》等。对于作为编辑的鲁迅，臧克家和许广平分别撰文赞扬鲁迅高尚的编辑品格、认真的工作态度。

除了相关史实的回忆之外，对鲁迅的出版工作也进行了整体的观照和评价。唐弢在《鲁迅先生的梓印工作》一文中梳理了鲁迅一生的出版工作，从主编各种杂志到参与未名社和朝花社的出版计划，并且涉及鲁迅与书籍装帧工作，认为：“鲁迅先生爱

^① 本节中涉及文章，请参见本书《鲁迅与出版界研究的历史及现状辑录》一节。

书，要洁净，要精美，喜欢自费梓行，却又毫不吝惜的持以赠人。”郑振铎则从鲁迅的辑佚工作入手，梳理了鲁迅对古籍搜辑和出版的史实，认为他的辑佚工作是“三绝”（创作、翻译、辑佚）之一，凸现出鲁迅在古籍出版方面的贡献。许钦文在《鲁迅先生与新书业》一文中较早地对鲁迅与新书业的关系进行了梳理，认为“在挥着大刀阔斧同恶势力斗争中，鲁迅先生，同时还惨淡经营新书业”；“所谓经营，自然只是指导与扶助。纯粹的新书业，可以说是由北新书局开始的，其次是未名社，都是以鲁迅先生的著作为基础而逐渐发达起来的”；并且认为，“盖棺论定，我国新书业得有目前的现象，好像也该算作鲁迅先生的功绩”。这是对鲁迅之于新书业意义的较早评价。

这一时期鲁迅与出版界研究的重心，更多的是在史料的回忆和整理方面，无论是鲁迅与杂志出版、鲁迅与出版社团，还是鲁迅与编辑及辑佚工作，都重在将相关史料收集、整理（这当然是鲁迅逝世后要做的第一步工作），虽然体现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观照，但遗憾的是开掘有余，纵深不足。特别是对于鲁迅与出版的整体认识、鲁迅对出版及出版界的深刻认知，尚处于朦胧阶段。尽管许钦文在《鲁迅先生与新书业》一文中，提及了鲁迅对于新书业的意义，但也只限于鲁迅对新书业的“指导与扶助”而已。

2. 发展期。“文革”结束后到90年代初，是鲁迅与出版及出版界的研究工作的发展期，研究工作开始恢复正常并进一步走向开阔的局面。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鲁迅与出版及出版界的研究更趋向多样化、具体化，研究群体不断壮大，呈现出一种繁复景象。

所谓多样化，是指这一时期鲁迅与出版界研究的表现形态的多样化。鲁迅与杂志研究在这一时期更加深入和广泛。不但重点杂志研究者较多，而且在现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小、存在时间较短的杂志也有挖掘。前者如《鲁迅先生与〈未名社〉（选刊）》（李霁野）、《鲁迅与〈译文社〉》（陈振国）、《鲁迅与〈莽原〉》（李霁野、张永江）、《鲁迅与〈语丝〉》（许毓峰）、《鲁迅与〈新青年〉》（孙玉石）、鲁迅与〈浙江潮〉》（罗慧生、王若海）、《鲁迅与狂飚社》（陈漱渝）等；后者如《鲁迅与〈河南〉月刊》（田孔白）、《鲁迅与〈萌芽〉月刊》（陈友雄）、《鲁迅与〈太白〉半月刊》（万一知）、《鲁迅与〈奔流〉月刊》（包子衍）等，而后者如《培育两株文艺幼苗——



《鼓浪》《波艇》》、《鲁迅与越风》、《鲁迅早期与报刊的关系》（张能耿）等。鲁迅与杂志研究开始进入一个相当集中的研究阶段。

鲁迅的编辑工作及其风格也开始成为出版研究的一个方面，并有逐步壮大的趋势。以鲁迅、编辑为关键词的研究文章蔚为大观，如《鲁迅编辑出版生涯中的人才思想及其实践》（张辉冠）、《鲁迅先生编辑风格琐谈》（李向阳）、《鲁迅编辑风格琐谈》（廖传江）、《论鲁迅的编辑审美指向》（朱昌法）、《试论编辑家鲁迅》（谢文学）、《乐将此身化经烛，甘为他人做嫁衣——学习鲁迅先生的编辑道德》（徐忠）、《“从别国窃得火来”——鲁迅与《奔流》的编辑工作》（李荣生）、《鲁迅的编辑道德浅识》（李荣生）、《鲁迅的编辑出版工作》（倪墨炎）、《鲁迅与编辑出版工作》（陈早春、王锡荣）等等，恕不一一列举。这些研究文章对鲁迅的编辑工作及其风格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和阐释，但大多文章还集中在史料的梳理方面，深入的阐释和理论的观照较少。

多样化的另一个表征是对鲁迅与各书局（出版机构）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如《鲁迅与商务印书馆》（金谭）、《鲁迅与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柳和城）、《鲁迅先生与北新书局》（李小峰）、《鲁迅与商务印书馆——鲁迅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著译》（陈江）、《关于开设“北新分局”的事情》（钟敬文）、《鲁迅与铁木艺术社》（曹予庭）、《鲁迅和春潮书局及其他》（张友松）、《鲁迅先生与生活书店》（黄源）、《鲁迅与书局》（周国伟、彭晓）等。这些史料的回忆、辨析及整理，为鲁迅与出版界研究走向纵深开阔的局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鲁迅与著名出版家的关系研究开始初显端倪，如《鲁迅与章锡琛》（振甫）。对于鲁迅与书局及著名出版家的研究，成为这一时期鲁迅与出版界研究的一个亮点之一。

还应指出的是，这一时期鲁迅与出版界的研究也进入了较为具体化的阶段，对鲁迅与书籍装帧、鲁迅与版本等相关研究也处于开展阶段。如《鲁迅的书籍装帧》（钱君匋）、《鲁迅书版丛话》（卢正言、史景树）、《鲁迅书版丛话（续完）》（卢正言、史景树）、《鲁迅与书籍装帧》（张道一）、《鲁迅与书籍装帧》（黄可）等，将这一研究课题更加具体化，深入到出版业的专业领域内，开始了相应的理论观照。这一时期的一个重大突破是几本研究专著的出版，如：《鲁迅出版系年（1906—

1936)》^①、《鲁迅著作版本丛谈》^②等。开始在整体上对鲁迅与出版及出版界进行观照,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应该说发展期的鲁迅与出版界研究较之于发轫期来说,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研究群体的不断壮大(不但有现代文学研究人员,而且很多专业的出版工作者都在关注这一问题),给这一课题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群体人员构成较为复杂,所做的研究也较为多样,从与鲁迅同时代人的回忆性文章到其后的青年学者的阐释和史料钩沉,均纳入其中,形成了繁复的景象。但这一时期的遗憾在于虽然史料的钩沉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但其整合的力度不够,方法较为单一。从中还不能看出鲁迅与出版及出版界的相互价值意味,以及其背后的深刻的历史动因。

3. 深化期。从90年代初到当下,是鲁迅与出版界研究的深化期。其特点是对研究对象的多侧面、多种理论观照显示出强劲的气势,并取得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

对于鲁迅与出版界的研究从史料的钩沉渐渐进入理论的观照、意义的探寻和思想的分析。这其中对鲁迅的编辑思想的论述,如:《论鲁迅的编辑思想及其现实指导意义》(王满新)、《鲁迅的编辑思想及其当代意义》(吴泽顺)、《鲁迅书刊编辑思想探析》(陈阳凤、梅莉)、《鲁迅编辑思想与实践初探》(张清雅)、《鲁迅的编辑理念与编辑实践》(李永明)、《学习鲁迅编辑思想的启示》(李欣)、鲁迅的报刊活动和他的办报思想》(方汉奇)、《鲁迅的编辑思想》(张秀江)、《坚守阵地“卖好货色”——试论鲁迅的办刊思想》(孙五川)等论文,以及专著《鲁迅的编辑思想》(张秀红)、《鲁迅与编辑》(张永江)、《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第2册)》(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编);有对鲁迅出版思想及实践的分析,如《鲁迅的翻译出版思想与实践》(刘霞)、《论鲁迅翻译出版思想》(吕明涛、宋凤娣)、《鲁迅编辑出版活动及其思想》(张辉学)、《〈铁流〉的出版与鲁迅的编辑思想》(惠萍)、《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周国伟编著)、《鲁迅著译系年目录》(上海鲁迅纪念馆编)、《鲁迅著译系年目录》(上海鲁迅纪念馆编)等。

还值得一提的是,将鲁迅与出版界置于各种理论的视野下

① 秦川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② 唐棣等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具有时代特色而又较有新意的结论。如《鲁迅从事文化编辑传播事业的原因与特色》（刘霞），将鲁迅与出版置于传播学视野下进行观照，认为鲁迅从事编辑出版业的原因之一，是“自觉利用传媒推动新文化的传播与建设，用以启蒙民众。并且通过构思与整合、选择与组构发挥其主体创造性”。而《鲁迅出版经济思想初探》（张志强）一文中，则从鲁迅的经济思想入手，认为鲁迅是一名“经营性编辑”，这一结论与当下的出版界思想多有恰合。除了应用传播学、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分析之外，还有哲学，特别是生命哲学，如《魔鬼的美：从鲁迅的出版活动看鲁迅的生命意识》（张立）一文。该文认为，“作为出版家，鲁迅以他博大精深的才智和悲剧性的命运为现代出版业开垦一条血迹斑斑的道路”。从鲁迅的近似“残酷”的编辑出版活动、出版物的内容和装帧上分析和再现出鲁迅的生命感觉和现代意识。这几篇文章是进入深化期以来，对鲁迅与出版界进行的较为深刻的理论阐释著作。

进入深化期的鲁迅与出版界研究涉及范围更广，如涉及书籍装帧、书评、广告、版权、版本等出版业相关的问题，初步显示出这一论题研究的开阔气象。然而，及至当下，鲁迅与出版界这一论题在发轫期、发展期所遗留的问题仍未解决，概而述之，有以下几点：（1）对鲁迅与出版界的整体观照不够，且没有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因而导致鲁迅与出版界整体轮廓模糊。（2）虽然在近年来，对这一论题的理论有所加强，但大都是不成体系的单篇分析，且理论运用多停留于表面的图解方式，深度不够。（3）对于鲁迅与出版界这一论题中的一些现象解释不够或较牵强，无法透析这些现象背后的历史动因。（4）对史料的钩沉、辨析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5）该论题意义并未引起研究界的足够重视，特别是在鲁迅学界。（6）鲁迅与出版界之间的互动研究不足，多停留于鲁迅对于出版界的贡献，而对出版及出版界之于鲁迅意义不作探讨。（7）对于鲁迅与出版界研究的意义挖掘不够，特别是在传媒时代下深入探讨这一论题的必要性、重要性等。以上几个方面的缺憾使得这一论题总体上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三、研究途径及现实意义

本文的主要研究路径是在钩沉鲁迅与出版界的史料的基础上，将其纳入社会学视野，借这一视角来分析鲁迅与出版界的相互价值意味，进而指向现代文学史和文学现象的阐释。本文的社